

公共政策终结研究 现状和展望

王 翀 严 强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周期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政策循环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政策学者已就政策终结的对象、策略、方式、影响变量等作了较多阐述,但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相比,仍嫌不够丰厚或有失偏颇。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结构—过程”框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政策终结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考察。

关键词 政策终结 政策过程 结构 过程 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 D035-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2)04-0012-06

自“公共政策之父”拉斯维尔提出政策过程的 7 阶段说之后,^①关于政策过程中的制定、执行、评估等赢得了政策学者广泛的研究热情,相形之下,政策终结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经济滞涨严重,政府采取的应对举措屡屡失败,随着对政府革新期待的落空,人们开始质疑,并进而要求结束那些行之有效的旧政策。然而,政策终结之难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在现实的触动下,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公共政策终结的重新审视和研究。

一、政策终结研究的发展脉络

政策学者在认识到政策终结的重要性之后,努力廓清了有关其定义、对象、策略、方式等相关理论命题,进而借助若干假设和分析框架对某些典型案例进行了观察、验证,并着重探究具体影响变量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方式。

迄今,学界共举行过 3 次较大规模的政策终结专题研讨,并有相应的论文集问世。1976 年《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首次出版以公共政策终结为主题的特刊。作为这一特刊的编辑,尤金·巴达奇(Eugene Bardach)撰文指出政策终结的特点,即:政策终结的现象如此之少,且个性特征很强,以致不能做出某种归纳;设计者希望政策能永久适用,政治领导人不愿意承认错误,政策终结往往充斥着残酷的斗争;潜在的改革支持者由于不确定是否能真的得到好处,也不愿意破坏现有的计划、组织;政策终结缺乏有效的政治刺激^{[1]23-131}。

1997 年,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第二部论文集由《公共行政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出版刊行。针对现实中政策难以终结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就政策终结的模式、终结中的影响变量等进行了较多探讨。彼得·狄龙(Peter deLeon)对此进行了总结,他突出强调了两点

收稿日期 2011-10-10

作者简介:王 翀(1971-)男,安徽无为,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严 强(1945-)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类课程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公共行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政治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07JZD0026)

①拉斯维尔所谓的 7 个阶段是: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终止和评估。

内容:一、某些当事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到阻碍力量中时,政策终结愈加不易;二、如何使终结人性化,且不牺牲必要的雇员和服务,这一点至关重要^[2]。

2001年《公共行政国际期刊》再次出版了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第三部论文集。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关政策终结定义的争议。马克·丹尼斯(Mark.R.Daniels)就最新学术成果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政策终结是个困难的智力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其下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定义的困难。什么才算是政策终结,政策究竟在何时、何处开始转变,以致与原貌不大一样,这引起了关于“部分终结”是不是政策终结的话题。他还认为,政策终结是多学科和跨领域的,存在于研究视线很狭窄的理论空间中,它常出现在政策科学期刊中,随之是公共行政期刊^[3]。

毋庸讳言,当前政策终结研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现实中成功的终结案例并不是很丰富;另一方面,相对于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有关政策终结的研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也显得不足。对此,戴伊认为,“无效率的政府政策和工程项目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那有限的效益被集中在了一小部分、非常有组织性的选民和机构身上,同时其巨大的成本则被分散给了一个广大的、缺乏统一组织性的、缺乏信息的公众来承受”^{[4]213}。显然,戴伊此语道出了个中原因之复杂性。宁骚则认为,“正是由于现实中政策终结的难度较大,况且人们一般也不愿意承认失败,因此相对而言,政策终结的研究比起政策过程的其它环节来要显得薄弱得多。”^{[5]468}

二、有关公共政策终结的理论研究

目前,中外学者对有关公共政策终结的理论进行了较多阐释。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政策学者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有关政策终结的界定、政策终结中的影响因素以及政策终结的策略和方式等3方面。

(一)政策终结的界定

关于政策终结的定义,大多数学者间存有共识。大陆学者陈振明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6]339}。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总结了政策终结发生的3种情形,即:政府施政理念改变、公共资源分配改变或是民众关于

公共政策态度改变,政策目标已经达成,政策问题已获解决,政策无法解决问题而失败^{[7]359}。彼得·狄龙、盖瑞·布鲁尔(Garry D. Brewer)和马克·丹尼斯等人对政策终结的论述较有代表性。所谓政策终结,是指“政府当局对某一特殊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深入评估而加以结束或终止的过程”^[2]。政策终结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特定政府的功能、组织、政策和计划,狄龙等人称之为政策终结的对象。一般认为:功能是政府对公民提供的一种服务,因此,很难终结,而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团队,组织比功能要更敏感,也很少完全终结,政策是解决特定问题的策略;计划与问题最近,是政策中的具体手段,也最容易终结。马克·丹尼斯进而确认了关于政策和组织终结的7项推论,并由此构成了政策终结研究的一个开创性理论框架,即:终结很少有经济理由,终结是高度政治化的,很难达到,终结需要反对者的共同选择;终结常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变化;紧随着终结的是重生;成功的终结很难预期,终结是个政治悖论,每个人支持它,但每个人也都反对它^[8]。

随着对政策终结的更多关注,有学者注意到存在政策“部分终结”的现象。此前,关于机构的重组、计划的合并、政策焦点的转移或资助水平的变化等现象都被排除在政策终结之外,但研究者很难说清政策终结由何处开始,即究竟在何时、何处政策开始转变?这个困惑被盖瑞·布罗尔、彼得·狄龙、查勒斯·琼斯(Charles O Jones)等人以所谓“部分终结”的方式加以解释。部分终结意味着计划、政策或组织的某些方面已经变化或消除,只剩下原貌的一些碎片。但即便如此,“终结”和“非终结”二者间仍存在模糊性。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干脆否认了政策终结的模式,并认为,在终结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模式,组织在经过长期的拖延后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靠运气,并将组织的终结排斥在政策终结之外^[9]。另一台湾学者庄文忠则将政策终结与政策接续同列为政策变迁的两种类型,同时指出政策存在“部分终结”的现象,即投入某一政策方案的资源或承诺的政策产出在质或量方面的减少^[10]。

(二)政策终结中的影响因素:阻碍和推动力量

按照狄龙的观点,政策终结中的主要障碍有:理智上的抵制、组织的持久性、有力的保守性、反终结联盟、既有的立法和高昂的启动费用等^[11]。豪格伍德和冈恩(Hogwood and Gunn)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政

策终结的 3 种障碍,即欠缺政治诱因、负面效果、拖延和拒绝^[12]474。大陆学者刘东杰将当前我国政策终结中的主要障碍归结为:来自政策制定者心理的障碍、来自政策执行者的障碍、来自组织方面的障碍、来自社会方面的压力、来自法律程序方面的障碍、公共舆论的障碍和政策终结的代价等^[13]。

在巴达奇看来,推动政策终结的力量来自 3 大类倡导者:反对者,他们不喜欢这个政策,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个坏政策;节约者,他们关心资源的再分配;改革者,政治人物把政策终结看成是成功吸收或实施一项替代政策的先决条件^[1]。狄龙认为,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是影响终结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经济和效率^[11]。为此,他建议在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大陆学者陶学荣等将政策终结的推动因素归结为:触发事件、政策评估、利益的分化和聚合、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公共舆论的推力等^[14]。

(三)政策终结的策略及方式

罗伯特·贝恩(Robert Behn)关于政策终结的 12 项忠告常为政策学者们引用,即:别放试探性气球;扩大政策的支持者;把焦点放在政策的危害性上以吸引支持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转变来证明危害;不要妥协;吸收局外人担任终结者;避免立法表决;不要侵犯立法机关的特权;接受短期成本的增加;收买受益者;提倡接受,而不是终结;只终结必要的部分^[15]。台湾学者丘昌泰在总结 Geva-May 提出的政策终结策略后,强调 3 点:即事前妥善规划、减低反对声音和利益交换^[16]454。林水波也从 6 个角度提出政策终结中的策略,即:改变犹豫心态;进行周全评估;掌握政治系络;体认自然时点;积极提供诱因;渐进进行缩减^[18]。大陆学者张国庆提出所谓力场分析,他认为,欲使政策终结得以发生,首先必须仔细分析现行政策安排下的力量对比。在改变力量的过程中,政府有 3 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增加推动力、削弱阻力、增强推动力和减少阻力并举。第三种办法最为有效,第二种方法次之,第一种方法效果最差^[18]415-417。

政策终结中的不同策略关系到政策的终结方式。巴达奇认为,政策终结过程可以当作是另一个政策的接受过程,即接受政策 A,以替代消除或缩减的政策 B。他还指出,终结的发生,要么是急遽式的,要么是渐进式的,也许是因为对终结的抵制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最后终结时伴随着爆发性的力量,所以

急遽式是最普遍的终结形式^[1]。陈振明则将政策终结的方式归结为 4 种:即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和政策缩减^[12]413-417。

三、有关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证研究

政策终结的实证研究多见于西方学者的论著,相对而言,我国学者更多表现出规范性研究的学术偏好,实证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案例研究固然有其个性化特征,但正如狄龙在比较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扶贫计划时所言,尽管两国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并不影响做出有益的归纳^[19]。而政策活动的愈益频繁无疑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案例素材。以下是从 JSTOR 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和 Policy Review (Wilson Select H. W. Wilson 公司的全文库)中,以 Policy Termination 检索出的关于政策终结实证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另有我国大陆地区的博士论文一篇,台湾地区的硕士论文一篇。

(一)关于分析框架的假设和验证

1995 年,马克·丹尼斯在《实施政策终结:田纳西州的健康卫生改革》一文中通过考察田纳西州实施的健康照料改革,即以州民照料计划取代其国民医疗补助计划,来检验罗伯特·贝恩提出的终结框架,对其有关终结策略的 12 点建议进行了逐项验证,并探究了政策终结和政策实施间的联系^[20]。

1999 年,苏珊·科克帕瑞克和詹姆斯·里斯特(Susan E. Kirkpatrick & James P. Lester)等人在《政策终结过程:财政分配的一个概念框架及其运用》一文中提出了关于终结公共产品的一个过程分析框架,并以此检验 1986 年美国联邦财政分配计划,最后得出影响终结的 3 个范畴的变量,即:该计划的内在特征、政治环境和特定的障碍^[21]。

2001 年,哈里斯·迈克尔(Harris·Michael)在《政策终结:以密歇根州会期限限制为例》一文中,通过对密歇根州立法会会期限限制的研究,检验了丹尼斯提出的关于政策和组织终结的 7 项归纳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框架^[8]。

2008 年,伊丽莎白·格蓝迪(Elizabeth A. Grady)和柯伊(Ke Ye)在《我们何时说“不”?当地医疗服务的政策终结决定》一文中,考察了 1981 年至 1995 年间的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医院,研究者将政治和经济对决策者的影响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两段式”模式,并在其研究结果中

得到印证,即触发事件和当地决策环境的特色影响了终结的决定^[22]。

以上4例中,研究者均侧重于建构或验证某个分析框架。由于政策或计划不同,政策环境以及发生决定作用的变量不一样,这些因应各具体案例的分析框架也就各有其侧重或针对性,政策终结进程由此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关于影响变量的研究

1997年,哈里斯·迈克尔在《政策终结:意识形态的维度》一文中,以以色列劳工党政府决定帮助基布兹集体农场摆脱困境为例,分析了意识形态在政策终结中的作用。劳工党作为过去的国家建设者和劳工社会党人理想的具体化及本身赋予的道德权威,尽管其政府面临巨大的预算压力,但他们并没有终结其支持的政策^[23]。

2001年,狄龙等人在《墨西哥国家团结互助计划:一项政策终结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借用源自美国的政策终结分析框架阐述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在考察了墨西哥扶贫计划后,狄龙等人在文章的结论中指出,在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中,外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在政策终结中的作用被大大增强^[19]。

2002年,Hajime Sato在《日本麻风病隔离政策的废除:通过领导者的政策终结》一文中,通过对日本麻风病隔离政策的考察揭示出阻碍政策终结的因素,分别是理智上的抵制、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专家的偏见。Hajime Sato认为,只有在熟练终结者的领导之下,问题才会最终被带到前台,并在关键人物间达成一致,于是政策才最终得以废止^[24]。同年,珍妮·弗朗兹在《政策终结者的政治资源》一文中以美国政府为麻风病患者提供的终身安居照料政策为例,分析了阻碍该项政策终结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病人、职员以及安置麻风病的社区等。文章最后指出,政府作为政策终结者,虽然有其地位上的理性,但其政治上的对手们也成功地阻止了(政策终结)近50年,只有在政府官员熟练地掌控政治资源的情况下,才可能终结该政策^[25]。

2004年,台湾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林廷威在考察农渔会信用部的发展和功能及面临的问题后,提出:政府从事改革行动,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农会的互动关系,政策终结的成败须讲究政治与时机的应用,其中包括了争斗策略的采行、执政者的意识

形态、政治环境的变迁或消失等^[26]。

2009年,Esther Turnhout在《一项政策的起落:荷兰生态走廊政策的连续及其不成功的终止》一文中,通过对荷兰终结有关生态走廊自然政策的分析,确认了促进和阻碍政策终结的不同因素,并以此作为对该案进行解释的基础。但文章同时指出,这些只是在个案中得以证明,并不能作为普遍的理论从而具有预见性^[27]。

以上诸例重在探究具体影响变量及其互动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策终结更多与政治相关,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但这些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并没有得到证明。

(三)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应用

以多源流分析框架来考察政策终结过程并不多见,应该说还是一种新的尝试。2004年,Iris Geva-May在《把握机会:公共政策的终结》一文中,对狄龙、考夫曼、丹尼斯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同时论述了金登(Kindon)多源流分析框架运用于政策终结的可行性。她还提出,现存的制度结构和对“问题”的界定,是维持组织稳定性的两个主要方面^[28]。吉林大学阮蓁蓁于2010年6月在其博士论文《多源流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终结研究》中,借助多源流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食品免检政策终结中的某些问题^[29]。

多源流分析框架的优势在于能够解释官僚机构出现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渐进主义者的困惑,特别是在回答政治因素在终结过程中的作用时,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足在于:首先,该种解释过于强调偶然性,可能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可捉摸;其次,该分析框架运用于政策终结有其限制前提,即仅能适用于政策替代,而非政策终结的其他情形,如政策的直接废止;其三,该分析框架没能反应出政策终结过程中间断平衡的特点。

上述实证研究的共性在于,无论是分析框架或是具体变量,均依附于特定个案,针对性较强,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因而,其研究结论欠缺一般性理论所具有的预见性功能。此外,研究者观察的视角比较单一,没能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政策终结现象做出全面解释。

四、新的研究路径:“结构—过程”分析框架的提出

事实上,政策终结总有其共性,那么,追寻这一

政策现象的普适规律,甄别并明晰其中变量及其逻辑生成关系,构建一般性的解释分析框架,进而描绘出终结过程中的图景,这应该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现有的政策过程理论,诸如多源流理论、间断—平衡理论、支持联盟框架等,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成果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和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构“结构—过程”分析框架,明确其中的关键性变量,兼顾渐进主义逻辑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政策终结进行考察。

(一)政策终结的结构分析

从结构上来看,政策终结通常会依据某种特定的逻辑围绕功能、组织、政策和计划这 4 种对象分别或同时展开,任何一种对象所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对象。从理论上说,功能是政策的灵魂和根本,功能与组织、政策、计划的关系是“皮—毛”的关系,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功能被终结,即政府不再向民众提供某种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则与此相关的组织、政策、计划都没有存在的理由^①,组织是为了履行特定的政策功能而设立,在保持政策功能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组织可以因时因势而作某些调整,如机构裁减、合并、经费增减、人员分流等,甚至可以撤销该组织,重新设立新的组织。组织的这些变动必然在政策和计划层面引起程度不同的反应,如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制改革即反映了此种情况;政策本身的终结关系到政策资源的利用和重新分配,影响到政策功能的实现方式和路径,且在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上也会有所体现,计划作为政策的细化,有时具有明显的技术性特征,计划本身及其执行的好坏也会连带到对功能、组织和政策的评判。计划的终结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策功能,消除政策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政策执行组织对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感受最深,它们可能在计划没有修正之前,对计划作某些变通性处理;反之,计划终结的效应也会折射在组织上,引起组织的松动,从而给进一步终结创造条件。

(二)政策终结的过程分析

从过程上来看,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关键性变量主要涉及到:问题事件的聚集、政策竞争的势态、政

治环境的变化、政策企业家包括媒体舆论的运作、限制条件的制约、领导者的决策等,其中的因果联系与逻辑程序可以描述如下:

某一政策场域中,与该政策有关的各种问题日益累积,其负面效应渐渐扩散。一方面,行将终结的政策继续发挥调节作用,虽力有不逮,仍勉力支撑。就该政策而言,清晰的任务功能、明确的合法性依据、长时间存续的惯性、完善的组织性以及人们怀旧的心理等都有助于延缓其生命力,且围绕该政策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既得利益者易于形成政策同盟,从而形成反对政策终结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支持政策终结的力量也会渐渐聚拢并形成同盟,对该项政策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新的政策建议则会见机而出,于是,政策论辩和竞争的气氛愈加激烈;此时的政治环境中,来自于上层的主导性价值观或政策偏好的转变、公众情绪的变化以及特定的地方传统因素等,都会在政策进程中引起联动效应。其间,保守主义、立法障碍、终结成本、心理上对终结结果的恐惧和不确定等因素构成了政策终结的现实限制条件。而支持政策终结的“政策企业家”如何利用和突破这些限制条件,经由开启的“政策窗口”^②,递进政策终结议程,则是决策前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使得政策终结进程不致处于胶着停滞状态,实行一定的妥协,以调和双方的矛盾冲突,既是折中之策,也是形势使然。至此,领导者才有可能根据自己对形势的把握,做出维持现状、突发式终结或渐进式终结的决策。维持现状则意味着政策终结的失败。突发式终结则是政策瞬时全面的停止,易于引发激烈动荡,产生“休克式”的后果。而渐进式终结则表现为终结进程在上述各种变量的作用下所进行的多轮演变。当领导者做出渐进式终结的决策后,终结进程的第一轮演变即告完成。此后整个政策场域暂时表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但新一轮竞争和角力也同时展开,以致重新演绎上述场景,直至政策完全终结。

实践中,政策终结以渐进式居多。以“结构—过程”分析框架观之,目标达成之前,政策过程往往是渐进式推进,以计划的终结最易,政策次之,组织再次,功能的终结最为困难。与此同时,整个政策场域呈现出间断平衡式的特征。无论政策进程处于间断或平

^①现实中,政策的功能不复存在,但组织却改头换面者,也不在少数,公共行政组织更是如此。

^②“政策企业家”和“政策窗口”的概念借鉴于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参见: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衡的状态, 都是政策场域中各种支持或反对力量交织、拉锯和角力的结果。可以说, 上述描述即是政策终结现象演变的常态, 正是在这样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 政策逐渐走向终结。作为政策研究者和从事政策实务的人员不应对此过程预想得过于简单平顺, 其间有曲折、有反复、甚至是偶有退缩。

[责任编辑 孙晋浩]

参考文献:

- [1] Bardach. Policy Termination as a Political Process [J]. Policy Sciences (1976).
- [2] deLeon Peter. Afterwards: The once and future state of policy term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Dec 1997.Vol.20, Iss.12; pg.2195, 18pgs
- [3] Mark R. Daniels. Policy and Organization Term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24(3), 249-262 (2001)
- [4] 【美】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5] 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6]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7] 林水波 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1.
- [8] Michael Harriis. Policy termination: the case of term limits in Michig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24(3), 323-339(2001)
- [9] Kaufman,Herbert. Time, Chance, and Organizations [M]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7).
- [10] 庄文忠.政策体系与政策变迁之研究: 停建核四政策个案分析[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2004.
- [11] deLeon.P. Policy Termina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The Politics of Program Evaluation ; Palumbo, Dennis Ed; Sage: Newbury Park, CA,1987; Publication ;173-189.
- [12]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3] 刘东杰.破解政策终结困境的有利因素分析[J].重庆行政, 2006(6).
- [14] 陶学荣,王锋.公共政策终结的可行性因素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5(5).
- [15] Behn, R.D. How to terminate a public policy: A dozen hints for the would be terminator [J].Policy Analysis,4(3),393-413 (1978a).
- [16] 丘昌泰.公共政策[M].台北:远流图书公司 2004
- [17] 林水波.政策终结的探索[J].国家政策季刊.第四卷第四期(2005.12).
- [18] 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Peter DeLeon.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 in Mexico: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cy Termin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24 (3), 289-309(2001).
- [20] Mark. R. Daniels. Implementing Policy Terminating: Health Care Reform in Tennessee [J]. Policy Studies Review, Autumn/Winter 1995/1996.
- [21] Susan E. Kirkpatrick James P. Lester. The Policy termination Proces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Revenue Sharing [J]. Policy Studies Review, Spring 1999 16: 1.
- [22] Elizabeth A. Graddy and Ke Ye. When Do We “Just Say No?” [J]. Policy Termination Decisions in Local Hospital Services”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36, No.2, 2008.
- [23] Michael Harris. Policy termination: uncovering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Dec1997.Vol.20, Iss.12; pg.2151, 25pgs.
- [24] Hajime Sato. Abolition of Leprosy Isolation Policy in Japan: Policy Termination through Leadership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2; 30, 1; ABI/INFORM Global pg29.
- [25] Janet E. Frantz. Political Resources for Policy Terminators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30, No.1, 2002(11-28).
- [26] 林廷威.农渔会信用部体制改革之研究—政策终结理论与内容分析法之应用[D].台北:台湾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2004.
- [27] Esther Turnh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olicy: policy succession and the attempted termina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Policy Sciences. Amsterdam: Feb2009.Vol.42, Iss.1.pg.57, 16pgs.
- [28] Iris Geva-May. Riding the Wave of Opportunity: Termination in Public Policy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ul2004;14,3;ABI/INFORM Global.
- [29] 阮蓁蓁.多源流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终结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0.

A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licy Termination: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WANG Chong YAN Qiang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